

流动的逻辑：解读创新创业者大城市聚集动力

吴 军 （北京市委党校 社会学教研部 北京 100044）

【摘要】讨论了诸如创新创业者等高级人力资本大城市流动聚集的动力问题，即该群体为什么在这里聚集而不是另外其他地方？传统观点认为，诸如收入和工作等经济因素在高级人力资本城市流动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是，根据对北京 1200 多个创新创业者访谈和问卷调查，结论并不完全是这样。单纯经济因素并不是该群体大城市流动聚集的唯一动力，甚至不是主要因素；相反，城市可提供的学习资源、公共服务、包容性、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等社会文化因素作为一种新动力在人口城市空间流动聚集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该群体的城市抉择不仅赋予了人口流动研究更多的社会文化意义，而且还为下一步城市增长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城市流动；创新创业者；社会文化动力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什么因素影响诸如创新创业者等高级人力资本大城市流动选择？传统答案是诸如收入高低和工作机会等经济性因素。但是，近十年欧美学术文献中，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经济因素在城市增长发展中已经开始慢慢失去主导作用^[1-3]。最近几年，国内学者对大学毕业生城市流动研究也说明了这一新现象，比如，工作和收入等经济因素并不是左右年轻人城市流动选择的首要因素^[4]。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欧美城市增长经历了“文化转向”（Cultural Shift）：收入与工作等经济性因素开始让位于文化因素，包括文化消费或参与、生活方式与体验以及城市包容性等。

基于国际对话与本土问题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方式来检验这种在欧美社会日益流行的“文化转向”在中国是否同样存在。实际上，根据前期研究，相较于欧美学者所强调的文化因素之外，社会性因素在中国人口流动中的作用也较为明显。这个发现为中国人口流动研究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基金项目：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研究”（15CSH005）；2015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创新驱动视角下北京创客群体发展需求与流动机制研究：兼与上海、深圳比较”（15JDSHB007）；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北京创新创业者发展需求与流动机制研究”（GNRC201605）

另外，根据本文研究的初步发现，在创新创业者等高级人力资本人群中，“城市”已不是简单的工作生产地点，也不像大卫·莫罗奇笔下的“增长机器”，反而更像是一种“娱乐机器”（Entertainment Machine），以消费为纽带的新社会组结形式。越来越多的创新创业者向大城市流动聚集，对于他们流动的动力，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赚钱”这个单一原因，而且还混合与渗杂了其他重要因素，比如，他们对梦想追求与价值自我实现、对大城市独有的生活方式以及经历着各种社会性互动与文化创造体验等。

尤其是随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浪潮来临，创新创业者群体在大城市中迅速崛起。他们是当代中国城市化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群体之一。他们的城市流动抉择不仅影响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与动力，而且还为下一步城市增长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1 文献回顾与聚焦问题

城市增长的经典理论分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韦伯。他们二者均认为，城市增长是区域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结果所导致。马克思曾指出，机器大生产引发了生产方式变革，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资本主义制度才得以确立，而城市发展从封建社会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逐渐演变为资本集中和雇佣劳动力聚集的区域或国家中心^[5]。但

随后的研究者意识到,经济因素在推动城市增长方面的作用开始降低,甚至逐渐失去主导作用,城市增长发展的传统模式已经过时^[6]。

在最近几十年城市增长发展文献中,城市经济增长已经不是简单的城市化过程,更多的是强调人口增长的动力。这一城市增长理论的主要逻辑是:人力资源的空间分布是由每个个体自由偏好选择的结果,这种偏好选择更多地强调城市空间质量,包括区域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与体验等^[7]。不同人群对不同区域品质和生活方式做出不同选择,并影响着城市流动聚集。因此,那些能够吸引高级人力资本聚集的城市就能够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因为这些流入的高级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8]。

事实上,纵观西方百年关于城市增长理论文献,其主要研究取向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传统模式,工业化生产与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增长发展,经济物质因素主导人口流动;其二是新模式,空间质量、消费娱乐、文化参与、生活方式与体验等推动城市增长发展,文化因素影响人口流动。

传统模式回溯到马克思与韦伯,强调工业化推动城市增长,工作和收入等经济性因素是个体迁移的决定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经济诉求为主的工业增长理论。同时,与经济诉求相对应的个体区位选择,更多表现出的是工业园区的空间概念,因为这里聚焦了为数众多的工厂或企业,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而这里的社会纽带是通过协调基于生产方式结成的不同群体的利益而形成的。这样的研究思路在中国学者研究里也有所体现。比如,借助西方理论框架在分析中国人口流动的原因上,更多学者把城市人口增长聚焦到城乡之间的“推力”和“拉力”上,城市比农村有着更多就业机会和相对较高的收入等因素影响着流动^{[9][10]}。

最近十年流行的城市增长发展的新模式,大致概括为三个流派:

一是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理论。佛罗里达认为,吸引和留住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11]。他认为,创意人才的出现可以增加城市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可以推动城市创新经济的增长,特别是高新技术与信息产业部门的增长与扩张。他特别强调,在新经济社会形态下,创意阶层人才聚焦到一起能够产生大量的社会性互动和文化创造,能够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环境氛

围,从而推动城市增长发展。

二是爱德华·格莱泽所强调的自然气候和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的聚集作用。他认为,自然气候环境和技术是城市增长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有的人群比较偏爱气候热的地区,如加利福尼亚海滩,有的人群比较喜欢寒冷一点的气候。他指出,全球化和创新网络的构建已经把传统城市变成了“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用科技与沟通给市民带来更多的竞争、更多创新观念和学习机会,从而使得人口城市流动聚集现象更加明显^[1]。

三是特里·克拉克提出娱乐机器(Entertainment Machine)的城市理论。他认为,类似创意阶层之类的人力资本城市增长模式是不完整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这种模式没有回答“人力资本最初在哪里聚集以及为什么在那里聚集”;其二是人力资本强调的人口增长,主要是指创意阶层等人群,事实上,公共环境对不同群体都会产生影响。克拉克等学者进一步分析指出,有些公共物品会影响到城市里居住的每一个人,如干净的空气和适宜的气候等。创意阶层可能更喜欢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或城市),而有些人群更喜欢有利于孩子教育和更加安全的社区等;老年人更倾向于适宜气温和漂亮山水的自然环境,而年轻人更倾向于诸如酒吧、书店、咖啡馆等设施与活动集中的社区^[7]。

在新模式的三种流派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推进这个议题,结合中国发展问题来探讨诸如公共环境品质、生活方式与质量、文化参与、娱乐消费以及城市包容性等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同时,为了区别于传统研究中的经济因素对人口流动的作用,本文把这种新因素统一归结为社会文化动力。那么,本研究主要是检验最近10年在美国社会日益流行的新城市增长模式在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以及新增长模式对于中国目前的城市发展有着怎样的指导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集中探索分析以下四个问题:

(1) 经济因素在创新创业者流动选择中是否开始失去主导作用?同时,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对该群体流动选择产生影响?

(2) 在众多影响流动选择的因素中,对于不同类型创新创业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怎么样的差异?

(3) 欧美社会日益流行的“文化转向”现象是否在中国大城市已经出现?

(4) 在城市增长理论模式上, 中国是否有自己独有(本土化)的特点呢?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基地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课题“创新驱动视角下北京创客发展需求与流动机制研究”。2015年9月起, 项目选取创新创业人士比较集中的地区——北京中关村1区16园进行整群随机抽样。抽样的地区有中关村创业大街、互联网教育创新、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中关村丰台园、朝阳798艺术区等, 发放问卷15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288份。最小年龄19岁, 最大年龄66岁。样本总体情况见表1。

表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项目	分类	样本量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812	63.6
	女	464	36.4
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	24	1.9
	高中或中专	76	5.9
	大专	180	14
	本科	720	56.1
	硕士	248	19.3
	博士及以上	36	2.8
婚姻状况	未婚	704	54.7
	已婚	556	43.2
	离异	28	2.2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240	19.0
	民主党派	36	2.8
	无党派人士	140	11.1
	群众	848	67.1
户籍情况	京籍	372	28.9
	非京籍	916	71.1
收入水平	5万及以下	248	19.3
	5万-10万	220	32.6
	10万-15万	248	19.3
	15-20万	112	8.8
	20万-25万	36	2.8
	25万-30万	112	8.8
	30万及以上	104	8.2
人员类型	普通员工	956	74.5
	合伙人	328	25.5

注: N=1288, 每个选项有效回答存在差异, 故具体到每项的有效样本量 1288; 调查对象各行业分布比例为: 电子商务(15%)、互联网教育(13%)、互联网金融(9%)、企业服务(11%)、本地生活(11%)、SNS 社交网络(9%)、文化娱乐体育(11%)、游戏(8%)、硬件(11%)和其他(2%)。

2.2 概念界定与操作化

概念界定。本研究涉及两个核心概念: 创新创业者和流动逻辑。针对第一个概念, 本研究所讨论的创新创业者是指利用科技把创意转化为产品并将产品生意化的人士。他们多从事一些新兴产业, 如电子商务、互联网教育与本地生活智能化 APP 开发等。流动逻辑是指城市流动选择的驱动力, 即什么因素驱动着创新创业者选择某个城市而非其他地方。

概念操作化。根据已有研究文献, 关于流动动力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种, 传统观点是经济因素, 如“收入情况”和“工作机会”等。除此之外, 涉及到社会文化范畴, 比如, 城市包容性、文化氛围、生活方式、公共服务和沙龙俱乐部等。

如果把该群体城市流动选择意愿作为因变量, 那么, 涉及到经济和社会文化要素就是影响流动选择的自变量。为了测量这些变量之间关系,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流动选择动力量表(表2)。

表2 创新创业者居留意愿影响因素测量

城市居留意愿影响因素	同意 =5分	一般 =3分	不同意 =1分
1 收入比较高			
2 工作机会多			
3 行业发展氛围好			
4 城市包容性强			
5 文化氛围较多			
6 生活方式比较有魅力			
7 公共服务好			
8 社区有活力			
9 学习资源丰富			

流动动力量表既包括诸如收入与工作等经济元素, 又包括诸如包容性、文化氛围、生活方式、公共服务等新动力。相较于传统观点所主诉的经济维度, 本研究对于流动动力的探索更加“多维”与“立体”, 不仅有经济因素, 还包括了社会文化范畴。

对于因变量的设定, 在问卷中, 用“假如现状不变, 您会选择北京长期居住吗?”问题来测量, 备选答案为“是=1”和“否=0”, 属于二分类变量, 命名为“居留意愿”。

根据研究文献和研究假设, 本文对创新创业者流动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 归结与提炼出了以下9个自变量, 1个因变量, 具体如下:

Y—居留意愿

X_1 —收入; X_2 —工作机会; X_3 —行业发展;
 X_4 —包容性; X_5 —文化氛围; X_6 —生活方式; X_7 —
 公共服务; X_8 —沙龙俱乐部活动; X_9 —学习资源

2.3 分析方法

首先, 本文利用流动选择影响因素量表进行频次与分数统计, 计算各因素的均值, 利用均值大小进行比较, 得出各个因素对于流动选择影响程度的初步结论。其次, 本文采用统计模型 LOGISTIC 回归进行参数估计, 对结论进一步分析检验。基本原理如下:

Logistic 回归属于概率型非线性回归, 假设在自变量 $x_1, x_2, x_3, \dots, x_n$ 作用下, 某事件发生的概率为 p , 则该事件不发生的概率就为 $1-p$, 发生概率与不发生概率之比为 $\frac{p}{1-p}$, 记作“ Ω ”, 对 Ω 取自然对数, 即得 Logistic 函数。

$$\text{Logit}(p) = \ln(\text{odds}) = \ln\left(\frac{p}{1-p}\right)$$

称为 p 的 Logit 变换, 则 Logistic 回归模型为

$$\text{Logit}(p) = \ln\left(\frac{p}{1-p}\right)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n x_n$$

在公式中 β_0 为常数项 $\beta_1, \beta_2, \beta_3, \dots, \beta_n$ 为回归系数, 误差项为随机变量, 均值为零, 方差存在。当 p 在 $(0, 1)$ 之间变化时, 对应的 $\text{Logit}(p)$ 在 $(-\infty, +\infty)$ 之间变化。根据该回归模型原理, 本文构建出创业者流动选择的“动力模型”。假如现状不变情况下, 创业者选择北京长期居住与否的概率为 p , 影响因素有 n 个 $x_1, x_2, x_3, \dots, x_n$ 。这 n 个影响因素的线性组合为:

$$y = a + \sum_{i=1}^m b_i x_i + \varepsilon$$

Logistic 多元非线性回归方程为:

$$p = \frac{\exp y}{1 + \exp y} = \frac{1}{1 + \exp(-y)}$$

据此, 创业者流动选择的动力预测模型为:

$$P = \frac{\exp y}{1 + \exp y} = \frac{1}{1 + \exp\left[-\left(\alpha + \sum_{i=1}^8 \beta_i x_i\right)\right]}$$

3 实证分析

传统研究认为, 诸如“收入”和“工作”等经济诉求是高级人力资本聚集到大城市的主要原因。但

是在欧美最近十年的研究文献中, 经济因素作为流动的主导因素开始让位于其他因素。那么, 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尤其是最近几年, 北上广深等超大型城市的发展, 正在谱写着大国崛起背景下的城市发展规律。据统计, 北京、上海和深圳 2015 年的城市化率分别约为 87%、89%、100%, 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发达国家普遍认为的 70% 水平。对于中国这些最发达的城市来说, 欧美社会日益流行城市增长的新模式是否在中国已开始出现呢? 中国城市发展是否展现了独特规律?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议题。

3.1 流动选择影响因素的量表均值比较分析

首先, 对影响流动选择的因素进行均值排序, 依据是被调查者在“流动选择动力量表”上的得分平均分。结果显示(表 3) 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都很重要, 其中经济性因素重要性程度高于社会文化因素。具体为“行业发展”(4.17) 是创新创业者选择北京长期居住的最重要原因, 其次是北京这座城市给他们提供的“工作机会”(4.09)。相较于行业发展和工作机会, “学习资源”(4.01) 在该群体城市选择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相较于行业发展、工作机会和人力资本(学习资源) 提升来说, “收入情况”(3.52) 对流动选择的影响并没有那么突出。这也说明了, 创新创业者对当下收入的多少并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么“在意”。

从这个角度来看, 诸如“收入”这样的经济因素在影响创新创业者等高级人力资本城市流动聚集方面开始失去主导作用。调查访谈资料也显示, 相较于收入情况来说, 该群体更看重的是城市提供的行业发展氛围与前景, 这个地区能够提供工作机会多少以及城市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等。例如, 北京高校密集提供了大量的 IT 人才, 营造了良好行业发展氛围, 也提供着众多新兴产业工作机会。

除此之外, 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3.57) 以及城市本身的“包容性”(3.57) 对创新创业者来说也非常重要, 对该群体的流动选择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 北京“生活方式”(3.41) 和“文化氛围”(3.30) 也超过了一般取值(3.0), 对创新创业人力资本城市流动选择也产生了重要作用。总之, 城市包容性、公共服务、学习资源、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等非经济性的因素对高级人力资本城市聚集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并且这种作用日益显著。

表3 影响北京创新创业者流动选择因素测量分值比较

排序	影响因素	平均得分
X ₁	收入情况	3.52
X ₂	工作机会	4.09
X ₃	行业发展	4.17
X ₄	包容性	3.57
X ₅	文化氛围	3.30
X ₆	生活方式	3.41
X ₇	公共服务	3.57
X ₈	沙龙俱乐部	3.21
X ₉	学习资源	4.01

注: 表中得分按照“同意”=5分、“一般”=3分、“不同意”=1分, 没

选=0分别赋值, 然后根据公式: $\bar{X} = \frac{\sum_{i=1}^n X_i Y_i}{\sum_{i=1}^n X_i}$, $\bar{X}$ 为均值, X_i 为选项

值, Y_i 为选择频次 $n=1288$; 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出该选项得分, 代表创新创业者流动选择因素得分, 意味着其对流动选择的影响程度。

以上分析是从创新创业者整个群体的角度探索了流动动力。接下来本文对群体内部流动差异进行分析, 即群体流动动力因素在内部是否存在差异呢? 比如, 创新创业团队中, 合伙人代表着核心人力资本, 普通员工代表着边缘人力资本, 二者角色功能不同, 受教育程度不同, 他们在城市流动选择动力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结果发现, 在城市抉择影响因素方面, 工作机会、行业发展和收入多少等经济性因素对于合伙人(核心创新创业人力资本)城市流动选择的影响程度均高于普通员工(边缘创新创业人力资本)。另外, “收入情况”对于二者来说, 都没有传统观点认为的那么重要, 二者得分仅为3.59和3.50, 远远低于人力资本提升、公共服务和城市包容性等因素的得分(表4)。除此之外, 合伙人在学习资源(4.12)、城市包容性(3.73)和公共服务(3.61)三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均高于普通员工。这也说明了核心高级人力资本的城市流动选择上, 城市可提供的学习资源、包容性和公共服务资源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表5 创新创业者流动选择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与参数估计

	B	标准误差 S. E.	瓦尔德 Wald	自由度 df	显著性 Sig.	Exp(B)
步骤 1 ^a	收入	0.059	0.438	1	0.508	1.060
	工作机会	0.088	0.647	1	0.421	1.091
	行业发展	0.027	0.063	1	0.802	1.028
	包容性	0.177	2.913	1	0.088	1.193
	文化氛围	0.163	2.360	1	0.125	1.177
	生活方式	0.003	0.001	1	0.979	0.997
	公共服务	0.140	1.652	1	0.199	1.151
	沙龙俱乐部	0.044	0.178	1	0.673	1.045
	学习资源	0.111	0.031	1	0.052	1.011
	常量	-2.774	20.739	1	0.000	0.062

注: 显著性 $P < 0.05$ 。

总之, 对于创新创业人力资本来说, 诸如“收入情况”这个经济因素在流动选择中的主导作用已经减弱。尽管“赚钱”对于他们来说仍具有很大吸引力, 但学习资源、城市包容性和公共服务也是很重要的。其中, 对于普通员工来说, 他们更在乎城市能否给其提供的工作机会和未来的职业发展空间, 而非当下的赚钱多少。

表4 不同创新创业人力资本类型的流动选择影响因素比较

影响因素	得分	
	合伙人(核心创新创业人力资本)	普通员工(边缘创新创业人力资本)
收入情况	3.59	3.50
工作机会	4.12	4.07
行业发展	4.17	4.16
包容性	3.73	3.52
文化氛围	3.32	3.28
生活方式	3.37	3.43
公共服务	3.61	3.55
沙龙俱乐部	3.29	3.18
学习资源	4.12	3.99

注: 表中得分按照“同意”=5分、“一般”=3分、“不同意”=1分, 没

选=0分别赋值, 然后根据公式: $\bar{X} = \frac{\sum_{i=1}^n X_i Y_i}{\sum_{i=1}^n X_i}$, $\bar{X}$ 为均值, X_i 为选项

值, Y_i 为选择频次 $n=1284$, 合伙人=328, 普通员工=956; 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出该选项得分, 代表创新创业者流动选择因素得分, 意味着其对流动选择的影响程度。

3.2 流动选择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参数估计

以上分析所得出关于流动选择影响因素的初步结论是否成立呢? 本文将利用 PASW Statistics 23 对其进行参数估计, 主要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

在进行参数估计之前, 对9个自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 9个自变量之间并不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5)。

在此前提下,运用 PASW Statistics 23 对其进行参数估计。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2.774 + 0.059x_1 + 0.088x_2 + 0.027x_3 + 0.177x_4 + 0.163x_5 + 0.003x_6 + 0.140x_7 + 0.044x_8 + 0.111x_9$$

则 Logistic 回归模型为:

$$p = [1 + \exp(2.774 - 0.059x_1 - 0.088x_2 - 0.027x_3 - 0.177x_4 - 0.163x_5 - 0.003x_6 - 0.140x_7 - 0.044x_8 + 0.111x_9)]^{-1}$$

表 6 模型系数的 Omnibus 检验

	卡方 Chi-square	自由度 df	显著性水平 Sig.
步骤 Step	29.736	8	.000
块 Block	29.736	8	.000
模型 Model	29.736	8	.000

表 7 分类表

实测 Observed		预测		
		居留意愿		正确百分比 Percentage Correct
		0	1	
居留	0	548	172	76.1
意愿	1	296	264	47.1
总体百分比				63.4

注: 分界值为 500

通过判别分析,模型预测结果的准确率为 63.4%。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此次的参数估计是比较有效的。

由预测模型可知,各因素与流动选择的相关关系。在 9 个自变量中,除了 X_6 系数是负值,其他 8 个选项都是正值,与城市流动选择呈现正方向变动,即城市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些因素,创新创业者更容易流入聚集。 X_6 为负数且取值较小,说明不受欢迎的生活方式对流动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由预测模型还可以发现,各个因素对流动选择变动的贡献。从各变量的系数来看,城市包容性、文化氛围、公共服务和学习资源等 4 个变量的系数比较大,它们对创新创业者流动选择的影响很大。其中,城市包容性影响最大,其次是文化氛围,再次是公共服务和学习资源。收入、工作机会、行业发展等自变量的系数较小,对该群体流动选择影响也就弱。这组数据说明,经济因素对于创新创业者等高级人力资本的城市流动选择并没有扮演主导性,相反,诸如城市可提供的学习资源、公共服务、城市本身的包容性、文化氛围以及沙龙俱乐部活动等非经济性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如果把收入作为经济因素的典型代表,那么,相较于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更容易吸引

聚集到创新创业者等人力资本群体。因此,研究假设提到“经济因素开始在流动选择中失去主导作用”的假设基本成立。这种城市增长的新现象在中国超大城市(比如北京)已经出现。

4 讨论与结论

高级人力资本向大城市流动聚集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创新创业人士是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的来临,这种人力资本的城市流动聚集更加明显。这种趋势直接影响着城市未来的增长方式和竞争力。但问题的关键是,该群体为什么在这里聚集而不是另外其他地方聚集呢?

传统观点认为,诸如收入和工作等经济性因素在高级人力资本城市流动选择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是,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创新创业者群体的研究并不完全是这样。结果发现,单纯的经济因素并不是该群体大城市流动聚集的唯一动力,甚至不是主要因素。相反,诸如城市包容性、文化氛围、公共服务、学习资源、沙龙俱乐部以及大城市提供独特生活方式等社会文化因素在流动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这种作用越来越明显。

这也印证了本研究假设(1)和(3)的合理性。单纯经济因素在创新创业者等高级人力资本群体流动选择中并不一定是主导性因素,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欧美社会最近十几年所日益流行的“文化转向”现象已经开始在中国超大城市中出现,至少在北京已经显现。相较于传统的城市增长模式,创新创业者等高级人力资本流入与聚集到北京,将会改变和重塑一种新的城市增长发展模式。这种新的增长发展模式将可能对中国其他的大城市发展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影响流动选择的因素中,除了西方学术界强调诸如包容性、文化氛围与创造以及生活方式体验等“文化”相关因素外,本研究还发现了城市可提供的学习资源、公共服务与沙龙俱乐部等“社会性”因素对城市流动的影响。即使是对于诸如创新创业者等高级人力资本群体,他们对城市可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能够带来更多社会性互动的沙龙俱乐部活动的需要。这与中国人独有的文化价值观、习俗和历史制度等有关,甚至与中国公共服务区域严重不均衡有关。本研究认为,正是这些新因素的加入,丰富了城市流动动力的内容,使得流动选择

影响因素分析更加“立体”,在解释力上更加多维,更加贴近人们实际的城市流动抉择。这也证明了研究假设(4)。但从创新创业者这个群体的城市流动来看,确实存在着中国独有的、本土化的特点。该群体对公共服务和社会性互动的需求恐怕是城市政策议程不得不考虑的议题。

总之,最近十几年欧美发达国家日益流行的“文化转向”尽管对中国诸如创新创业者等高级人力资本的流动选择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还不够充分。中国人独有的文化熏陶、历史背景和现实制度等,使得在人力资本城市流动方面表现出了本土化的特色,如特别强调公共服务维度。这与中国区域发展极其不平衡、城乡与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不无关系。因此,如果说“文化转向”在中国超大城市已经出现,倒不如说是“社会文化转向”在中国超大城市已经出现。这样更贴近中国高级人力资本流动逻辑,更具有中国人群流动特点,更有解释力。

本研究对于政策实践的意义在于怎么推动下一轮的城市增长发展,吸引优秀人力资源流动聚集,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如何吸引与留住这批年轻的、创新型高级人力资本是城市未来竞争制胜的关键。本文呈现的创新创业人士流动选择的影响因素,对城市吸引聚集人才、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不足与反思: 无论本文多么努力进行研究设计与收集数据,无论多么小心地处理访谈资料,仍然存在着不足。这主要反映在对流动选择的社会文化逻辑并没有更全面且深入细分; 另外,现实中,除了这9个被发现的逻辑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因素对流动发挥着很重要影响呢? 对于这个问题,由于经费与人力限制,在本文并没有很好呈现,希望今后的跟踪研究在这方面进行弥补。△

【参考文献】

- [1] Glaeser E L. The new economics of urban and regional growth[J].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1: 83-98.
- [2] Florida R.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2: 743-755.
- [3] Clark T N. Urban amenities: Lakes, opera, and juice bars: Do they drive development? [J]. *Research in Urban Policy*, 2003. 9: 103-140.
- [4] 吴志明, 马秀莲. 文化转向: 大学毕业生城市流动的新逻辑[J]. *当代青年研究* 2015, 1: 88-93.
- [5] [德]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人民出版社, 2009: 131-165
- [6] Clark Terry.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J]. Amsterdam, Netherlands; Boston, MA: Jai/Elsevier, 2010, 05: 209-236.
- [7] 特里·N·克拉克. 一起卡拉OK VS 独自打保龄球: 西方规则转为发展与民主驱动力的场景诠释[J]. 吴军, 译, *社会学评论*, 2015, 6: 44-53.
- [8] Cary Wu. Moving from Urban Sociology to the Sociology of the City [J].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015: 1-13.
- [9] 李强. 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1: 125-136.
- [10] 翟振武, 段成荣, 毕秋灵.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与分析[J]. *人口研究* 2007, 3: 30-40
- [11] [美]佛罗里达. 创意阶层的崛起[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1-30.
- [12] Clark T N, Lloyd R, Wong K K, Jain P. Amenities drive urban growth[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2. 5: 493-515.

作者简介: 吴 军(1984-), 男, 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讲师, 博士; 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培养城市学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政策, 文化与城市发展。

收稿日期: 2016-05-08

The Logic of Urban Migration among Technological Talents

WU Jun

【Abstract】It'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that why the technological talents flow gather to big cities in China. Why do they choose to gather an area or city rather than others? The traditional argument is that economy factors, such as earning money and hunting jobs, play a key role. However, it's found in recent research that pure economic factors are not the only dynamics of gathering these talents.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re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their urban migration, according the survey with 1280 samples. Public services, inclusive, lifestyle and culture participation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low. This paper labels these factors as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of the logic of urban migration among technological talents in China.

【Keywords】Urban Migration; Technological Talents;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